



《长日留痕》的价值镜像与思政启示 ——基于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课程教学实践

王桃花¹ 盛之涵²

【摘要】高校在课程思政教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高校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英美文学课程理应承担起“立德树人”的时代使命。然而，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如何将英美文学与课程思政有机融合，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仍是亟待探讨的问题。基于此，本文选取英国当代作家石黑一雄的代表作《长日留痕》为分析文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爱国”“敬业”“诚信”三个维度为分析框架展开阐释：其一，“爱国”应建立在理性判断与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其二，“敬业”需在情感投入与职业责任之间保持平衡；其三，“诚信”要求青年对自己、他人及历史保持忠诚。本文旨在通过文本分析传递正确的价值观，为英美文学教师提供课程思政的教学范例，推动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的深度融合，实现人文教育的价值引领功能。

【关键词】《长日留痕》；思政教育；爱国；敬业；诚信

1 王桃花，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英国文学。邮箱：wangth3@mail.sysu.edu.cn。本论文为“2023年度中山大学本科教学质量工程项目”阶段性成果。

2 盛之涵，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英国文学。邮箱：shengzh3@mail2.sysu.edu.cn



The Value Mirror and Ideological Insights of *The Remains of the Day*: Curriculum Practice Grounded in China's Core Socialist Values

Wang Taohua¹ Sheng Zhihan²

【 Abstract 】 Universities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implemen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in their curricula. As an integral component of humanities educatio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courses are expected to fulfill the fundamental mission of moral cultivation and character building. However, in practical teaching, how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literary instruction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objectives—so as to guide students in developing sound values—remains a pressing pedagogical issue. This study selects *The Remains of the Day*, a representative work by contemporary British novelist Kazuo Ishiguro, as the analytical text, and interprets it through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patriotism, dedication, and integrity. Specifically: (1) patriotism should be grounded in rational judgment and independent thinking; (2) dedication requires a balance between emotional commitment and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3) integrity calls for loyalty to oneself, to others, and to history. By conveying sound values through textual analysis,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a pedagogical model for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courses, thereby promoting the deep fusion of value education and disciplinary teaching and enhancing the moral guidance function of humanities education.

【 Keywords 】 *The Remains of the Da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atriotism; dedication; integrity

1 Wang Taohu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 British Literature. Email: wangth3@mail.sysu.edu.cn. This research is supported by “Sun Yat-sen University Undergraduate Teaching Quality Project of 2023”.

2 Sheng Zhih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 British Literature. Email: shengzh3@mail2.sysu.edu.cn.



引言

高校历来是国家培养人才的主阵地，肩负着立德树人、塑造青年核心价值观的根本使命。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有重要的育人功能，要面向全体学生，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养成科学思维习惯，促进身心和人格健康发展”（习近平，2016: 23）。由此可见，高校在育人体系中的职责不仅在于知识传授，更在于依托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塑造健全人格。在此背景下，高校课堂在思政教育体系中的关键作用愈发凸显。2020年，教育部党组会议审议通过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指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立德树人成效是检验高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就是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人才培养的应有之义，更是必备内容”（中国政府网，2020）。在此指导思想下，各学科专业纷纷致力于推动课程思政建设的系统化与实效化。具体到英美文学教学领域，如何在课堂中有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将文学教育与价值引领相结合，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三观”，仍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对此展开探讨，不仅有助于提升英美文学教学的育人功能，也为高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提供了新的路径与思路。

在高等教育学科体系中，英美文学作为大学英语专业的核心课程，承载着不可替代的育人功能。从知识生产的维度看，英美文学不仅是语言学习的重要范本，更是培养人文素养、塑造批判性思维、深化价值认知的关键载体，契合哲学社会科学“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聂珍钊指出，文学的核心价值在于为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提供丰富的知识、经验和范例，“为人类的文明进步提供道德指引”（聂珍钊，2014: 9），并以内化于心的方式推动社会文明的持续发展。这种精神建构功能在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文化理论中同样得到印证。他强调：“一个社会一旦不再重视文学，也就等于是致命地自绝于曾经创造并保持了人类文明精华的推动力”（伊格尔顿，1987: 40）。在全球化语境下，英美文学的学术价值与育人功能愈加凸显。作为世界文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英美文学深刻参与了现代性的塑造过程，其蕴含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念对英语专业人才培养具有独特意义。学者普遍认为，英美文学是区分英语专业与普通外语教学或语言培训的重要标志（王卓，2019: 9；顾悦，2016: 44），高校开设英美文学课程，尤其教师引导学生对经典作品进行欣赏与批判性阅读，对于学生的语言能力培养与价值观塑造均具有重要作用。顾悦指出：“英语专业扬弃补习班模式，回归以经典阅读为核心，文学教育是首当其冲的重点”（顾悦，



2016: 44)。尹晶亦呼吁将思政教育有机融入英国文学经典阅读中(尹晶, 2021: 84)。

然而, 现有研究关于英美文学课堂思政融合的探讨多仍停留在宏观层面的理论指导。孙有中提出“人文英语教育”这一新范式, 主张更新“语言教学与知识教学和跨文化思辨教学相矛盾的观念”(孙有中, 2017: 859); 张旭春基于《国标》和《指南》分析英语专业现存问题, 并从总体层面提出建议(张旭春, 2020: 11-13); 顾明栋则针对技术变革带来的“后文学时代”, 提出“小文学”和“大文学”概念, 以探讨更新文学课程体系的可行路径(顾明栋, 2019: 71)。然而, 英美文学课程思政融合在实践层面仍需进一步探讨: 具体到每一堂课、每一部作品, 教师应如何深入挖掘文学作品中的人文内涵, 将思政教育有机融入教学过程? 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对于推动英美文学课程的价值引领功能、实现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深度融合,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在英国当代文学谱系中, 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 1954—)以其独特的叙事策略与深刻的伦理思考独树一帜。2017年, 石黑一雄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瑞典皇家学院在颁奖词中评价他“以极具情感冲击力的笔触, 揭示了人类与世界虚幻联系之下的真实深渊”(The Nobel Prize Literature, 2017)。其中, 《长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堪称其艺术成就的代表之作。作为1989年布克奖获奖作品, 《长日留痕》以英国管家史蒂文斯的回忆为叙事主线, 呈现了主人公如何在“尊严”的执念下, 逐步陷入对勋爵的盲从、对情感的压抑以及对历史责任的逃避。小说通过对这种价值认知异化过程的深刻揭示与批判, 超越了时空和文化界限, 成为一部探讨历史、责任和人性的文学经典。从课程思政建设的视角审视, 《长日留痕》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文学艺术性上, 更在于其对价值观教育的启示意义。小说中主人公扭曲的“忠诚”观念与错位的价值认同,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爱国”“敬业”“诚信”的要求形成了鲜明对照。基于此, 本文选取该文本为研究对象,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爱国”“敬业”“诚信”三个层面出发, 对作品进行价值阐释, 旨在为英美文学课程中思政教育的融合实践提供可借鉴的教学范例。

一、扭曲的精英式“爱国”

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与理论传承。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担当精神, 再到周恩来总理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时代誓言, 这些精神坐标共同构建了以国家利益至上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根据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 这种家国情怀



本质上是将个体生命价值纳入“家—国—天下”的伦理网络之中。费孝通将其比作“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费孝通，2004: 32）。这表明，个体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在伦理意义上是层层扩展、相互联结的。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中，“爱国”被置于个人层面的首要位置。这一价值定位既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与忠诚观，又赋予其新时代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习近平，2020: 112-113）。作为新时代肩负民族复兴使命的青年，应当以爱国主义为精神核心，立志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进程，以正确的价值判断，“把爱国主义的价值标准作为根本尺度和最高价值原则”（冯秀军 & 王先亮，2023: 95）。

然而，在全球化语境下，爱国主义的内涵与表达方式面临新的理论挑战。当个体将“爱国”确立为最高价值原则时，如何在多元文化与全球视野中理性地表达爱国情感，成为新时代思政教育亟需回答的问题。石黑一雄的小说《长日留痕》中，主人公史蒂文斯（Stevens）与其雇主达林顿勋爵（Lord Darlington）正因坚守了偏离道义的“错误爱国观”，而酿成了无法挽回的历史悲剧。这一文学呈现揭示出：若缺乏理性判断与道德自省，爱国主义极易异化为盲目的服从与道德误区。

小说中，达林顿勋爵以“维护英国国家利益”为名推行绥靖政策，其行为实质上是一种情感投射而非理性选择。作为出身显赫的英国贵族，达林顿家族已在达林顿府居住逾两个世纪。20世纪20至30年代，勋爵多次在府邸举办会议，邀请英、法、德等国政要与社会名流就国际事务展开讨论，成为英国上流社会外交活动的重要场所。一战结束后，好友的自杀给勋爵带来了强烈的情感冲击，加之对德国战后困境的主观同情，使他个人情绪误认为“维护这个世界的正义”的政治实践（石黑一雄，2014: 70）。在他看来，自己“并没有参与到反对德国民族的仇杀中去”（石黑一雄，2014: 70）。这种自我辩护强化了他内心的道德正当感，也使身边的人坚信他是一位真正的绅士，其追求不过是世界的公正与和平。然而，从理性层面分析，达林顿勋爵的政治行为显然体现出情感驱动与理性缺失的特征。这种以主观情感代替理性判断的决策模式，使其行动严重偏离国家利益轨道。真正的爱国主义应当建立在理性认知与道德自觉的基础上，即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利益相结合，并在必要时以牺牲个人利益来维护整体利益。这种出于理性思考的选择，才是符合社会伦理与国家责任的正确的爱国实践。

除此之外，勋爵对国际局势缺乏清醒认知。他企图以善意换取世界和平，却忽视了纳



粹政权的侵略本质，其所谓的“爱国”并未建立在现实基础上，而是停留于理想化的幻想之中。正因如此，在贵族身份的加持下，他无意间沦为纳粹最得力的政治棋子。正如卡迪纳尔先生（Reginald Cardinal）所揭示的那样：“我要告诉你这一点，史蒂文斯。勋爵正被人愚弄……他正被他人所摆布。纳粹分子正把他当作马前卒来摆布”（石黑一雄，2014: 212）。当勋爵命令史蒂文斯驱赶府中两名犹太女仆时，他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纳粹的共谋。此举不仅表明了他对纳粹政权的默认与支持，也在事实上助长了法西斯势力的扩张，给世界带来了深重的历史创伤。这种脱离历史语境与人民立场的“伪爱国主义”，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真正“爱国主义”背道而驰。正如谭桂林、韩龙所言，勋爵“操纵公权谋求和平，将利益政治依附于庄园之内的符号性场所，他的崇高理想被证明是虚伪的投机”（谭桂林 & 韩龙，2025: 91）。真正的爱国主义，应当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实现价值理性与情感认同的辩证统一，以理性的历史判断为基础，以人民立场为核心，实现个人情感与国家利益的有机融合。

作为达林顿勋爵的男管家，史蒂文斯对英格兰风景的极致赞美，构成了其爱国主义情感的直接表达。出于对职业的高度敬业与责任意识，他长期坚守在达林顿府，几乎从未离开工作岗位。直到在府邸的新主人法拉戴（Farraday）先生的建议下，他才驾驶主人的汽车，开启了一段为期一周的旅行。

旅行的第一天，史蒂文斯在途中偶然登上一处山丘，俯瞰乡村风景，被眼前的自然景致深深打动。夜晚，当他回想白日所见时，感慨道：“英格兰的风景是无可媲美的……它所具有的特征是别国风景根本无法具有的……我深信，在任何实事求是的评论家面前，这种特征都将无可争议地表明，英格兰的风景在全世界都是最让人满意的，而且这种特征只有用‘伟大绝伦’一词才可能概括”（石黑一雄，2014: 26）。他进一步认为：“我们把我们的国土称之为‘大’不列颠，也许有些人会认为这有点儿不太谦虚，但是我却敢冒昧地说，单是我们国家的风景就足以证实，如此高尚的形容词用在这里是当之无愧的”（石黑一雄，2014: 26）。由此可见，史蒂文斯对祖国山河怀有深厚的情感。爱国主义首先体现为对祖国自然与文化的热爱。这种情感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同样得到强调——广袤的国土、秀美的山川构成了民族共同体情感的基础，也孕育了“江山即家国”的文化心理。新时代青年理应具备这种对祖国山河的真挚热爱与自豪感。然而，真正的爱国主义不应停留在情感层面，而应落实为理性认同与实践行动。青年爱国者不仅要珍惜祖国的美好山河，更应以实际行动维护国家利益、辨明是非、抵制一切损害国家发展的行为。这种以理性判断为导向的爱国实践，才是新时代公民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然而，史蒂文斯的爱国主义呈现出明显的精英主义倾向——面对勋爵有损国家利益的行为，他选择沉默与顺从。小说中，勋爵曾命令史蒂文斯“停止对当地一家定期来到府上的慈善机构捐款，那是因为该机构的管理委员会‘或多或少与犹太人类似’”（石黑一雄，2014: 140）。对此，史蒂文斯虽感到“很吃惊”（石黑一雄，2014: 140），却仍将其视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石黑一雄，2014: 140）。

勋爵曾命令史蒂文斯遣散府内的两名犹太职员，尽管在事后，史蒂文斯向肯顿小姐（Miss Kenton）坦白：“说实话，那样做并不正确，而且也不公平。那整个事件曾引起我极大的忧虑，确实是极大的忧虑。这是我很不情愿看见在这府内所发生的那类事”（石黑一雄，2014: 147）。但在当时他仍选择服从。面对肯顿小姐的质疑与不满，他镇定地回应道：“你现在所处的地位还不足以使你做出如此盛气凌人的决断……而至于勋爵，我也许敢这样讲，他处于某种更高的地位来判断什么事最佳的”（石黑一雄，2014: 143）。最终，两名犹太女仆被迫离开达林顿府。正如赖兹（Rosemary Rizq）所指出的那样：“史蒂文斯对勋爵错位的忠诚和毫无保留的拥护早已凌驾于他的情感、看法、思想或道德责任之上”（Rizq, 2023: 753）。与达林顿勋爵相似，史蒂文斯的爱国主义体现出明显的精英主义局限，他坚信国家的重大事务应由上层绅士阶层决定，普通民众既无权力，也无能力干预政治，只能服从权威。因此，即便多年后勋爵已逝、达林顿府早已易主，当史蒂文斯听到史密斯表达自己对国家事务与“尊严”的看法时，他仍认为对方“异想天开”，并坚持认为要求普通老百姓对国家重大争论发表主张“肯定是不明智的”（石黑一雄，2014: 185）。这种观念反映出他长期受制于等级秩序与盲从忠诚的思维模式，将无条件服从误认为爱国责任。然而，真正的爱国主义不应建立在社会等级与精英垄断之上，而应体现为公民共同的政治关怀与理性参与。每个公民都有权表达对国家事务的关切并承担社会责任。只有当爱国从少数人的特权转化为全民的自觉行动，并以人民利益为中心时，爱国主义才能回归其真正的价值本质。

不可否认，达林顿勋爵与史蒂文斯都怀有深厚的爱国情感，但他们的爱国主义观念却过于狭隘。勋爵的“爱国”未能超越个人情感与阶层利益的局限，对国际局势缺乏清醒认识，最终误入歧途；史蒂文斯的“爱国”则停留在对国家山河的感性赞美之中，却在面对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时选择沉默，甚至将国家政治视为精英阶层的特权领域，否认普通民众的发言权与主体地位。于是，他对雇主言听计从，将盲目服从误认为忠诚。勋爵与史蒂文斯的案例警示我们：当爱国主义被情感化、个体化，脱离了理性判断与历史语境，或被异化为精英阶层的象征性资本时，其精神内核便会发生扭曲。真正的爱国主义应以人民立

场为根本，以理性思考为前提。青年一代唯有在深入理解国家利益与时代使命的基础上，将爱国热情转化为理性自觉与实践行动，才能实现个人理想与民族复兴的同频共振。

二、异化的工具性“敬业”

在关于《长日留痕》的研究中，评论家们讨论最多的莫过于主人公史蒂文斯的职业观。拉什迪（Salman Rushdie）指出，史蒂文斯所崇尚的“伟大”实则是“一种伪装、怯懦，是一个谎言”（Rushdie, 1991: 245），而他的职业生涯，乃至整个人生，都是一个“愚蠢的错误”（Rushdie, 1991: 246）。学者亦普遍认为，史蒂文斯在职业选择中的盲从与压抑，导致他丧失了人性与个体生命的尊严（余小蕊，2024: 71；郑品苏，2018: 96；丁纾寒，2013: 133）。总体而言，学界普遍以否定与同情的态度评价史蒂文斯的职业理想，认为他将所谓的“尊严”视为职业的最高追求，却未能真正实现职业价值，反而在过度的自我约束中荒废了一生。然则，史蒂文斯毕生恪守职责、勤勉敬业，为何其人生仍以悲剧告终？这一悖论引人深思，也为探讨“敬业”与“人性”之间的张力提供了新的价值维度。

史蒂文斯将“尊严”作为职业信仰的最高准则，这一理念驱使他在工作中恪守近乎宗教仪式般的严苛标准。他对“尊严”的理解，深深植根于父亲长期反复讲述的三则关于前代男管家的故事之中。在父亲的叙述中，第一则故事讲述了一位杰出的男管家：在晚宴开席前，一只老虎闯入餐厅，他沉着冷静地将其击毙，整个过程客人只听到三声枪响，对此事全然不知。父亲将其视为典范。第二则故事中，父亲面对两位醉酒客人的无理挑衅，始终保持克制与礼貌；当对方以言语侮辱他的主人时，他以坚定的目光和威严的气势予以回击，成功维护了主人的尊严。第三则故事则更具道德冲突：史蒂文斯的兄长因上级指挥失误在战场阵亡，父亲对此怀恨在心。然而，当那位指挥官以贵宾身份造访雇主府邸时，父亲强忍悲痛，仍以最专业的礼仪完成接待，甚至获得对方的赞赏。

基于这三则故事，史蒂文斯却得出了一个狭隘的结论：“‘尊严’的至关重要处在于男管家必须具有不判离其所从事的职业本色的才能”（石黑一雄，2014: 39）。他将职业风范比喻为：“体面的绅士穿上考究的西服，他是绝不允许任何恶棍，或是任何情况在大庭广众面前将其衣服撕破的”（石黑一雄，2014: 39）。李春风指出：“史蒂文斯不仅在思想上靠近达林顿勋爵，他在穿衣打扮以及行为举止上更是一直模拟达林顿勋爵”（李春风，2022: 285）。史蒂文斯将职业与“体面绅士”的外在形象相联系，其根源正是这种无意识的模仿心理。



然而，真正的绅士风范并非通过形式化模仿即可获得。勋爵家族自维多利亚时期起便拥有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社会地位，其“绅士身份”早已通过家族传承和文化资本深深内化。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标准涵盖教育背景、经济成就、婚姻规范及宗教信仰等多个维度（Berberich, 2007: 21-22）。这些特质经过长期积淀，已融入勋爵家族的精神气质与社会身份之中。相比之下，出身普通工业家庭的史蒂文斯，在短时间内难以真正理解并内化这些深植于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中的“绅士精神”。因此，他将“尊严”误读为一种绝对理性的职业自我控制，并以此为全部人生信条。这种僵化而片面的职业信仰，最终使他丧失了情感的温度与人格的完整，也为其之后冷漠、压抑而悲剧性的人生埋下了伏笔。

诚然，史蒂文斯对“尊严”和绅士风度的执着追求，曾使他在职业生涯中取得显著成就。例如，他对银器上色和擦拭的近乎苛刻要求，使府内银器光洁如新，赢得宾客的广泛赞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勋爵的政治声望。正如丁纾寒所言，在史蒂文斯身上，我们“能感受到一种崇高的职业精神和自我克制的理性能力，这种职业精神和理性能力在现代文化中正变得越来越罕见”（丁纾寒，2013: 136）。然而，当职业理想脱离人格完整而被绝对化时，敬业精神便可能异化为自我束缚。一个人在追求职业成就的过程中，若失去主体意识、过度压抑人性，其“敬业”不仅难以实现自我价值，反而可能误入歧途，导致精神上的空虚与命运的悲剧。

敬业精神理应建立在主体性与独立意识的基础之上。唯有保持自我价值判断，个体才能在职业活动中实现职业理想与人格价值的统一。然而，史蒂文斯却以牺牲主体性与独立思考为代价，将自身完全附属于达林顿勋爵。在秉持精英主义观念的史蒂文斯眼中，勋爵代表着典型的英国绅士形象，是无可置疑的道德与政治典范。他深信，国家大事唯有此类“真正的绅士”才有资格与能力裁决，他们的判断必然高瞻远瞩，超出常人理解的范围。这种根深蒂固的信念深刻影响了他的行为选择。当勋爵以反犹理由命令他辞退府内犹太女仆时，史蒂文斯虽知此举不公，却依然照令行事；当卡迪纳尔先生提醒他应警惕并劝阻勋爵避免重蹈覆辙时，他依旧保持沉默，只因他坚信勋爵“正尽其所能以确保和平将持续地遍及欧洲”（石黑一雄，2014: 215），也“绝对相信勋爵准确无误的判断力”（石黑一雄，2014: 215）。在这种盲目的忠诚之下，史蒂文斯逐渐丧失了独立判断与道德自觉，沦为执行命令的“职业机器”。他对上级的无条件服从掩盖了内心的虚荣与依附心理——通过服务权贵来获得存在感与职业意义。这种以敬业之名掩饰的自我消解，实质上是一种精神异化，使他在职业上被塑造成“完美的仆人”，却在道德上丧失了作为人的尊严。最终，史蒂文斯的悲剧不在于他缺乏敬业精神，而在于他将敬业绝对化，将盲目服从误认为职业道



德。正如他所象征的那一代人一样，过度的顺从与自我否定，揭示了当“职业伦理”脱离人格主体后所带来的深刻人性危机。

史蒂文斯的敬业精神以牺牲情感为代价，而这一代价最终换来的，是他孤独终老的悲剧性结局。在其价值认知体系中，能够让他感到“自我满足”的时刻寥寥无几，然而，他却荒谬地将父亲去世的那个夜晚视为“在他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坚实地构筑起了一个转折点”（石黑一雄，2014: 106）。1923 年的那个夜晚，达林顿府正举行一场重要的国际会议。作为男管家的史蒂文斯，全身心投入工作，自始至终守在会场，随时准备提供最周到的服务。与此同时，年迈的父亲病入膏肓、生命垂危。面对工作与亲情的抉择，史蒂文斯毫不犹豫地将前者置于首位。即便肯顿小姐一再提醒他父亲的病情恶化，他仍以会议正在进行，自己忙得不可开交为由，拒绝上楼探望父亲最后一面。这种冷漠的决定并非出于对父亲的怨恨。相反，史蒂文斯对父亲怀有深深的敬意与崇拜。父亲与肯顿小姐同时进入府邸工作时，肯顿小姐出于习惯以教名称呼父亲，史蒂文斯却坚持要求她使用尊称，理由是“父亲是一位非同一般荣誉的人物，从他身上你（肯顿小姐）可以学到许多有益的东西”（石黑一雄，2014: 52）。由此可见，史蒂文斯内心深处对父亲怀有真挚的情感。然而，畸形的职业观念却彻底扭曲了这种情感。他将亲情视为干扰职业理性的外在情绪，并以此为由压抑内心的爱与悲痛。在父亲临终之际，他选择继续履行“职责”，错失了最后的陪伴机会。更为讽刺的是，他竟将这一违背人伦常理的行为视作对“尊严”的坚守，并在多年后仍“油然而产生极大的成就感”（石黑一雄，2014: 106）。史蒂文斯的“敬业”因此蜕变为情感的自我放逐：他以职业理性为名压抑人性温度，将忠诚与冷漠混为一体。这种错位的职业伦理不仅毁灭了他作为儿子的温情，也预示了他作为人的完整性的瓦解。

除了在亲情面前的冷酷抉择，史蒂文斯在爱情面前同样表现出了令人困惑的克制。多年共事中，他与肯顿小姐之间逐渐产生了微妙的情愫，但两人始终未曾坦露心迹。肯顿小姐多次将鲜花放入史蒂文斯的房间，情意已然显露；然而，史蒂文斯虽敏锐察觉，却始终保持理性的距离。某个夜晚，肯顿小姐鼓起勇气告诉史蒂文斯自己即将订婚，言语间流露出希望他表态、甚至隐约期待他挽留的心意。然而，史蒂文斯仅以惯常的礼貌道出“恭喜”二字，随即以公务为由结束谈话，逃避了情感对峙的可能。片刻之后，他明知肯顿小姐独自落泪，却依旧选择上楼为宾客服务。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当一切结束，史蒂文斯冷静下来之后，他竟感到一种“切实的成功感”（石黑一雄，2014: 217）。因为在那个夜晚，他再次坚守了“尊严”，排除了情感因素的干扰，努力服务几位绅士，“紧紧地贴近了重大事件的中心”（石黑一雄，2014: 217）。在他看来，这种对情感的压抑与克制，是职业成



熟与人格尊严的体现。然而，这种将“尊严”与情感禁欲等同的观念，最终使史蒂文斯在职业理性与人性温度之间彻底失衡。爱情，本应是人性中最纯粹、最富创造力的情感，而史蒂文斯却在对职业完美的执念中错失了生命中唯一的真情。所谓“成功”，不过是他以理性之名压抑情感、以敬业之名否定自我的人生幻象。

在追求“尊严”的漫漫征途中，史蒂文斯抛弃了亲情，拒绝了爱情，竭力压抑自己的情感，最终逐渐异化一部仅为满足主人需求而运转的“机器”，过着近乎清教徒式的禁欲与单调生活。正如学者所言：“职业精神和文明礼貌是工作中的重要价值观，但必须与个体满足和真实性相平衡，才能过上真正可信且充实的生活”（S, 2023: 462）。回顾一生，史蒂文斯所能回忆的唯有工作，这一情景令人深感悲凉。史蒂文斯的悲剧并非个体命运的偶然起伏，而是旧时代职业伦理内在缺陷的典型体现。在这种伦理框架中，职业被等同于服从与牺牲，人的价值被压缩为工具性的存在。相较之下，社会主义所倡导的敬业精神具有更为深远而积极的价值内涵。它强调“为人民服务”与“激发劳动者的创造性”（蒋家胜，2018: 127-128），主张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实现个体价值的统一，而非机械地遵循秩序、维护权力或资本的利益。真正的敬业并不意味着扼杀情感或压抑个性。相反，敬业应当以理性为尺度，在情感与责任之间寻求平衡，使职业操守与人文关怀相互融通。唯有如此，职业活动才能超越功利性劳动，成为实现道德完善与人生价值的过程。这才是新时代应当追求的职业理想。

三、崩塌的伪饰化“诚信”

人无信不立，诚信作为社会交往的基石，是构建信任关系、维系社会秩序与实现价值交换的基本道德准则，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出：“诚信既是个人道德的基石，又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诚信缺失的个人将失去他人的认可，诚信缺失的社会将失去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支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4）。由此可见，诚信不仅关乎个体品格，更是社会稳定与文明进步的关键纽带。在石黑一雄的《长日留痕》中，作者巧妙运用“不可靠叙述”（unreliable narrative）的叙事策略，将整部作品建构于主人公史蒂文斯精心编织、却漏洞重重的回忆迷宫之中。读者所能接触到的叙事内容呈现出“片面的、不完整的、也是有限的。故事中有些事情他并不清楚，也无法告知读者”（Rizq, 2023: 755）。这种不可靠叙述在文本层面上制造了认知张力，而在人物层面上，则为史蒂文斯提供了一个逃避现实的“心理庇护所”。通过选择性回忆与自我辩解，史蒂



文斯试图为自己和过去的行为寻找合理化的解释。他对事实的隐瞒与扭曲，并非出于叙述无能，而是出于有意的“自我欺骗”。其根源在于他内心深处对“体面”与“尊严”的执念——为了维护外在的道德形象，他宁愿在叙述中构筑谎言，也不愿直面内心的负罪感与历史责任。因此，小说中的“不可靠叙述”不仅是一种艺术手法，更象征着史蒂文斯在“诚信”层面的失落：他通过言语塑造了一个看似理性的自我，却在精神层面背离了真诚与自省的道德底线。

史蒂文斯的不可靠叙述，实则构成了他自我蒙蔽的隐秘机制，使“诚信”在最私密的认知领域中沦陷。杜晓宇指出：“‘诚’字指向内心，即‘不自欺’”（杜晓宇，2023: 72）。然而，自叙事伊始，史蒂文斯的讲述便暴露出明显的自我欺骗特征。当新主人法拉戴先生建议他外出欣赏英格兰的美丽风光时，史蒂文斯的回应耐人寻味：“从去乡村郊游、去美丽如画的风景名胜地观光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确了解甚少；然后干我们这行的人又确实比大多数人更‘了解’英格兰，因为我们深处英格兰名流显贵常常聚集的豪宅里”（石黑一雄，2014: 4）。他进一步自诩，多年来“一直享受着了解英格兰最美好之处的特权”（石黑一雄，2014: 4）。这番话揭示了他深层的自恋与傲慢——在潜意识中，他将勋爵视为英格兰的象征性代表，进而将达林顿府等同于整个国家的精神中心。正如格雷尼尔（Richard Grenier）所言：“如果一个完美的管家服务的雇主本身是一位地位显赫的人，那么管家的地位便自然得到提升。这种想法偶尔会出现在史蒂文斯的头脑中”（Grenier, 1994: 65）。

史蒂文斯宣称比大多数人更了解英格兰的傲慢论断，正是他在空间认知层面上自我欺骗的生动写照。在这段充满悖论的内心独白中，他将物理上的封闭错认作精神上的特权——拒绝承认自己被府邸所囚禁的现实，而是将这座豪宅神化为英格兰最美妙的圣地。这种错位的认知反转，暴露出他内心深处被等级意识所支配的思想结构：他将“美妙”与“名流显贵”相绑定，实则以社会地位取代了文化认同。这种自我设限的认知骗局，犹如一层厚重的迷雾，不仅遮蔽了史蒂文斯真实的生存困境，也在叙事层面完成了对“诚信”的第一次“谋杀”。在长期的封闭与依附中，他逐渐沦为一只安于井底的“蛙”，用虚构的特权取代对现实的直接经验，以对权力的膜拜冒充对文明的理解。这种自欺的认知姿态，既是对自我的背叛，也是对“诚”的彻底否定——他失去了对现实的真诚感知，也丧失了对自我的诚实反思。

除了自我欺骗之外，史蒂文斯还通过欺骗他人来逃避责任、满足虚荣，从而进一步背离了“诚信”的道德准则。早年的史蒂文斯以能侍奉达林顿勋爵为莫大荣耀。他深信，如



果管家想要为创建美好世界而奉献一份力，那么最可靠的途径就是效力于“伟大的绅士，因为他们手中掌管着文明”（石黑一雄，2014: 112）。因此，他不断更换雇主，“频繁地从某一雇主的门下改投到另一主人的帐前”（石黑一雄，2014: 112），只为追求能够实现“伟大抱负”的服务对象。直到受聘于达林顿勋爵，他才认为自己获得了“天赐良机”（石黑一雄，2014: 112）。在他看来，为勋爵效劳不仅是职业巅峰，更是人生荣光的象征。

然而，当历史证明勋爵的政治立场和绥靖行为成为民族的耻辱时，史蒂文斯选择了否认与掩饰。无论是旅途中遇到的勤务兵，还是前来参观庄园的韦克菲尔德（Wakefield）夫妇，当被问及是否曾为达林顿勋爵效力时，他都矢口否认：“绝对没有”（石黑一雄，2014: 118）。面对法拉戴先生的询问，他则以“雇员议论其前任主人是不符合英格蘭德传统习惯的”（石黑一雄，2014: 120）为借口，将这种否认美化为“善意的谎言”（石黑一雄，2014: 121），自我辩解称这样可以“尽量避免听到更多有关勋爵的此类胡言乱语”（石黑一雄，2014: 121）。然而，这样的解释连他自己都难以信服。其用语中反复出现的“似乎”（seem）正泄露了他内心的不安与动摇。实质上，史蒂文斯否认过去并非出于道德克制，而是出于自我防卫——他害怕他人将勋爵的罪责投射到自己身上，从而贬低他毕生所奉行的职业尊严。拒绝承认曾为历史的罪人效力，实质上是拒绝面对自我失败的现实。他以谎言维系“尊严”的幻象，以沉默和否认阻挡良知的拷问。杜晓宇在论述“诚信”时指出：“‘信’字指向外界，即‘不欺人’”（杜晓宇，2023: 72）。从这一意义上看，史蒂文斯不仅“自欺”，更“欺人”。他的否认行为揭示了诚信在他身上全面崩塌的事实——他既失去了对自我的诚实，也丧失了与他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关系。

与此同时，在漫长的岁月中，史蒂文斯始终未能真正找到自我。为了追求理想中的“绅士”形象，他刻意模仿雇主的言行举止与谈吐风格。日积月累，这种模仿几乎内化为他行为的本能——他举手投足间流露出绅士的风度，甚至在出门旅行时仍穿着达林顿勋爵赠予的旧衣。这样的装扮，使他在外人眼中几乎可以以假乱真。当旅店的村民询问他是否是一位真正的绅士时，史蒂文斯并未否认，反而含蓄地暗示自己是某个领域的权威人士，“更多地关注国际事物”（石黑一雄，2014: 178），赢得了村民的敬重与仰慕。那一刻，他沉浸于他人误认带来的满足之中，仿佛终于拥有了梦寐以求的社会身份。即便内心清楚这份“荣光”建立在虚假之上，他仍心甘情愿地维系这场幻觉。然而，这种以谎言维系的尊严恰恰暴露出他深层的身份危机。史蒂文斯的“伪装”不仅是外在行为的假象，更是内在精神的迷失。他在长期的模仿与依附中逐渐模糊了自我边界，将他人的身份误认为自身的存在价值。正如他的“不可靠叙述”掩盖了事实真相，他的身份伪饰也掩盖了内心的空洞与



不安。最终，这种对“绅士”形象的执念演变成为一种精神枷锁，使他在幻觉中寻求尊严，却在现实中失去了做“自己”的能力。这正是史蒂文斯人格崩塌与诚信沦陷的又一体现——他不仅欺骗了他人，更在幻象中彻底背叛了自我。

史蒂文斯不仅陷入自我欺骗的泥沼，对他人实施虚假言行，更在叙事中对历史进行了蓄意的歪曲与篡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诚信”的阐释中指出，诚信要求“真实”，即“不有意歪曲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不因为什么原因，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而有意去歪曲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4）。然而，史蒂文斯在回忆达林顿勋爵时，却始终拒绝承认其曾犯下的严重错误。

据他的叙述，勋爵生前多次表现出对德国的同情，曾以“绅士外交”的名义为纳粹政权提供便利，甚至驱逐府内的犹太女仆——这些都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然而，当社会舆论一致谴责勋爵时，史蒂文斯却坚称：“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会比这派胡言更为违背事实真相的了”（石黑一雄，2014: 59）。在他的记忆中，勋爵始终是一位高尚而谦和的英国绅士，一个真正为世界和平奔走的理想主义者。这种叙事策略有意削弱勋爵在历史事件中的道德责任，使读者难以将其与“历史罪人”的身份联系起来。然而，个人品格的高低并不能掩盖其历史行为的实质。史蒂文斯通过粉饰与重构，将道德判断转化为情感辩护，在意义层面上消解了勋爵的过错。这种“叙事性修辞”不仅篡改了事实，更是对历史责任的主动逃避。在此意义上，他对历史的叙述已不再是记忆的复现，而是一种选择性的重写——一种以个人尊严之名行历史背叛之实的道德伪装。这不仅使“诚信”在叙事中被彻底侵蚀，也揭示出其人格崩塌的终极形态。

史蒂文斯的“诚信”大厦最终轰然坍塌，其崩塌过程始于“欺己”，止于“欺史”，构成了一场系统性的道德溃败。在不可靠叙述的巧妙伪装下，他背叛了真实的自我，欺骗了他人，更以粉饰之笔篡改了历史，实现了从“自欺”到“欺世”的灵魂沉沦。史蒂文斯的悲剧为我们敲响了深刻的警钟——诚信的失守，实质上意味着人之为人的根基的崩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诚信”，并非对个人行为的浅层约束，而是一种全面的道德自觉。它要求我们做到：“诚己”——勇于直面内心，不自欺；“诚人”——敢于承担责任，不欺人；“诚史”——敬畏事实真相，不伪世。唯有在“诚己—诚人—诚史”的统一中，个体才能在复杂多变的时代保持精神定力与道德自省。对于新时代的青年而言，这既是道德修养的底线，更是立身立业的基石。唯有坚守真实，方能在历史的浪潮中保持主体性与清醒的历史自觉，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真实的人”。



四、结语

石黑一雄的经典之作《长日留痕》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现代文明在重塑价值理性过程中所付出的血泪代价。通过对文本中“扭曲的精英式‘爱国’”、“异化的工具性‘敬业’”以及“崩塌的伪饰化‘诚信’”的分析，我们得以窥见现代社会中人类精神的伦理困境与道德迷失。当价值失去了理性的判断、人性的温度和主体的真诚，再崇高的名义也终将蜕变为束缚灵魂的枷锁。《长日留痕》之于当代中国思政教育的意义，正在于其反面启示作用——它以人物的精神异化为镜像，反证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指向：真正的“爱国”，应以理性判断与独立思考为前提，立足人民立场，服务民族命运；真正的“敬业”，应在情感与责任之间保持平衡，拒绝将人异化为冷漠的职业工具；真正的“诚信”，应源于对自我、他人及历史真相的坦诚与敬畏。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征程中，《长日留痕》为青年提供了一面自省的镜子，使他们洞察价值扭曲的深渊，体悟理性与真诚的可贵。唯有在批判性思考中坚守信念、涵养品格，当代青年方能成长为既怀家国情怀、又具职业操守、更守精神真实的“大写的人”。

【参考文献】

- 丁纾寒. (2013). 帝国“遗民”的悲怆与救赎——关于小说《长日留痕》的文化反思 [*The Sorrow and Salvation of Imperial “Adherents”: The Cultural Reflection of The Remains of the Day*]. 浙江社会科学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12), 131-136. <https://doi.org/10.14167/j.zjss.2013.12.004>.
- 杜晓宇. (2023). 我国传统文化在诚信社会建设中的创造性运用探究 [*Exploring the Creativ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Building a Trustworthy Society*]. 征信 [*Credit Reference*] (11): 71-77.
- 费孝通. (2004). 乡土中国 [*From the Soil-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北京出版社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Group].
- 冯秀军, 王先亮. (2023).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关于爱国主义的理论创新 [].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Leading Journal of Ideological & Theoretical Education*] (05): 94-101. <https://doi.org/10.16580/j.sxlljydk.2023.05.020>.
- 顾明栋. (2019). 从“小文学”走向“大人文”——“后文学”时代文学新概念的理論探索 [*From “Small Literature” to “Greater Humanities”: Theoretical Inquiry into a New Concept of Literature in the Post-literary Era*]. 外国文学 [*Foreign Literature*] (03): 71-82. <https://doi.org/10.16430/j.cnki.fl.2019.03.009>.



- 顾悦. (2016). 回归经典阅读: 英语专业的人文性与基于阅读经验的文学教育 [*Back to Classics: The English Major and Experience-based Teaching of Literature*].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02): 42-46.
- 蒋家胜. (2018). 新时代社会主义敬业文化的新内涵、新价值与新路径 [*New Connotations, Values, and Paths of Socialist Professional Dedication Culture in the New Era*].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Leading Journal of Ideological & Theoretical Education*] (12): 127-131. <https://doi.org/10.16580/j.sxlljydk.2018.12.027>.
- 中国政府网. (2020).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 [*Notice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n Issuing the Guidelin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2025 年 6 月 18 日引自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6/06/content_5517606.htm.
- 李春风. (2022). 空间·身份·共同体: 《长日将尽》的解读 [*Space·Identity·Community: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mains of the Day*].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02): 282-293. <https://doi.org/10.16754/b.cnki.ymwxyjlc.2022.02.024>.
-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4). 第三节 诚信: 公民道德的基石 [*Section 3: Integrity – The Cornerstone of Civic Virtue*]. 2025 年 6 月 18 日引自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506/c384764-24981837.html>.
- 聂珍钊. (2014). 文学伦理学批评: 论文学的基本功能与核心价值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On Fundamental Function and Core Value of Literature*]. 外国文学研究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04): 8-13. <https://doi.org/10.19915/j.cnki.fl.2014.04.002>.
- 石黑一雄. (2014). 长日留痕 [*The Remains of the Day*]. 冒国安, 译. 译林出版社 [Yilin Press].
- 孙有中. (2017). 人文英语教育论 [*On Humanities-Oriented English Education*]. 外语教学与研究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06): 859-870.
- 谭桂林, 韩龙. (2025). 哀悼、解构和重塑英国性: 《长日留痕》中的文化空间研究 [*Mourning, Deconstructing and Reshaping Englishness: A Study of Cultural Space in The Remains of the Day*].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01): 90-97. <https://doi.org/10.16339/j.cnki.hdxbskb.2025.01.010>.
- 王卓. (2019). 回归与创新: 《国标》视野下高校英语专业外国文学课程体系建构 [*Return and Innovation: Construc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Curriculum System of English Specialty in light of National Standard of Teaching Quality for English Major Undergraduate*]. 外语电化教学 [*Technology Enhance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05): 7-12. <https://doi.org/10.20139/j.issn.1001-5795.2019.05.002>.
- 习近平. (2016).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Speech at the Forum o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人民出版社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习近平. (2020).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 [On the Propaganda and Ideological Work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中央文献出版社 [Central Party Literature Press].
- 伊格尔顿. (1987). 文学原理引论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刘峰等, 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ress].
- 尹晶. (2021). 经典阅读与思政教育——英国文学课程思政体系之尝试性建构 [The Reading of Literary Classics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 Tentativ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of British Literature]. 中国外语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02): 84-90. <https://doi.org/10.13564/j.cnki.issn.1672-9382.2021.02.016>.
- 余小蕊. (2024). 《长日留痕》中史蒂文斯的创伤表现、根源与自我修复解析 [An Analysis of Stevens' Trauma and Repair in The Remains of the Day]. 集美大学学报 (哲社版) [Journal of Jime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04): 67-75.
- 张旭春. (2020). 《国标》与《指南》框架下英语专业改革刍议 [A Modest Proposal on English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tandards and The Guide]. 外国语文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05): 8-13.
- 郑品苏. (2018). 《长日将尽》的“不可靠”叙事 [Unreliable Narrative in The Remains of the Day], 出版广角 [View on Publishing] (19): 94-96. <https://doi.org/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19.029>.
- Berberich, C. (2007). *The Image of the English Gentleman in Twentieth-Century Literature*.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 Grenier, R. (1994). Servants, Masters, and the Art of Bantering[J]. *The National Interest*, 35: 65-72.
- Rizq, R. (2023). What the Butler Never Said: Psychoanalysis and Knowledge in Kazuo Ishiguro's *The Remains of the Day*[J].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39 (4):751-764. <https://doi.org/10.1111/bjp.12863>.
- Rushdie, S. (1991). *Imaginary Homelands*[M]. London: Granta Books.
-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17). NobelPrize.org. Nobel Prize Outreach 2025. Wed. 18 Jun 2025.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literature/2017/summary/>>
- S, C. B. and Dr. Vijayalakshmi S. (2023). Portrayal of Professionalism in Ishiguro's *The Remains of the Da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eative Research Thoughts* 11 (4): 462-466.

(责编: 李力)